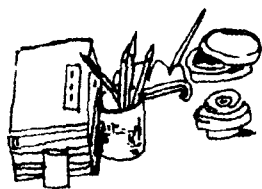


谢兴尧 著

堪
隐
斋
杂
著

山 西 古 籍 出 版 社



堪隱齋叢著

謝興堯 著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太原市橋東街東崗巷110號）

新華書店經銷 山西新華印刷廠印刷

*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9.875 插頁：1 字數：246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冊

*

ISBN 7—80598—226—0

I·113 定價：15.00元

卷首絮语

文史不分家,堪称治学古训。鲁迅评《史记》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以兼善文史取则,推为最高典范。回首历代硕学大家,文章巨公,莫不淹贯文史,通才博学。惜时至当今,学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学文,鲜能造就通才。有鉴于此,我社广邀名家,纵而谈史,横而论文,各出一集,合成丛书,名之曰《当代学者文史丛谈》,实则以随笔之体为文史知识之自由谈。综观谢兴尧等老先生,均为国内兼通文史而卓有建树者,此次慨允我社诚邀,精心选辑其文史随笔,合旧篇新文于一编,述历史人物则评其曲直,讲风俗民情则探其本源,数典章制度则溯其沿革,征引丰富,多所参稽,而性情所至,谈古论今,烛幽洞微,切中时弊,率能集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体,于广大读者不啻为熟面孔下的新创作。故本丛书不仅在于增知识,佐谈助,要而可窥见其一家之言,探寻其治学思想及轨迹,而多有所获。

谢兴尧先生终身致力于太平天国史研究,与简又文、罗尔纲并称名家。三十年代与简又文在上海创办《逸经》杂志,做为学术研究阵地,广邀当时南北一流学者、作家如周作人、俞平伯、老舍、谢国桢、瞿兑之、徐一士、林语堂、郁达夫、赵景深等撰稿,与他们建立了深厚友谊。他本人也因之写了大量文史随笔,近年出版的《堪隐斋随笔》收入多篇,吸引了大量读者。《堪隐斋杂著》则多为近十余年新作,大多未经发表。其中分说梦、史论、杂考、随笔四部分。说梦乃忆旧之作,情深意长,资料丰富;史论则见识老到,多半为先生研究太平天国的精心之作;杂考论水浒人物、论明英宗等,也十分精彩;随笔属掌故杂记,知识性极强。其中谈《红楼梦》之文,多所发见。先生于文史有精深研究、独到见解,著文“不作哗众之辞,不作违心之论”,文笔老辣中透出幽默,诚然大家风范。尤其谢老以九十二岁高龄赐稿本社,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序 言

三年前，我出了一本书《堪隐斋随笔》，由辽宁教育出版社编入《书趣文丛》第二辑。“文丛”十册，由十人撰写，成为一套丛书。在集稿付印时，多少带有集体齐一的意思。我这本随笔，有新作，也有旧稿，陆续交卷，不免仓促，有些需要附写小序说明，因时间关系，没有赶上，如“记湖北提督博勒恭武因逃匿处斩事”（《随笔》第217页），是一篇关于太平军的重要史料。因洪杨革命，组织太平军，有两次重要机遇：第一次是最初，洪杨揭竿而起，缺乏武器，道光末年三元里人民抗英之后，清廷欲和，解散民团，团中壮士义民携械散于四方，大多数参加了太平军，洪杨势力，骤然强大；第二次即攻下岳州，岳州在湖南北端，洞庭湖畔，又名三江口，控制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咽喉要道，清初（康熙十三年），吴三桂称周王反清，由云南出师，经贵州到湖南，即以岳州为战略要地，清军屡攻不下，在这一线，鏖战至两三年之久。至康熙十六年，吴三桂已六十七岁，称帝后死于衡州（衡阳），清军乃收复长沙、岳州各处。经过百年

之后，太平军出师北进，岳州清方守将，提督博勒恭武，是一位老将军，竟不战而逃。岳州是吴三桂储存军械之地，太平军攻下岳州，获得大批军械，《洪秀全传》云：“咸丰三年十月，秀全于长沙南门外，获玉玺，众呼万岁，遂夜渡湘水，抵益阳，渡洞庭，入岳州。城中旧储吴三桂军械，至是尽以资敌。秀全驾龙舟，树黄旗，列巨炮，夜张灯，数十里火光如昼，遂陷汉阳，东下至南京。”当然，太平军的胜利，革命意志是其主因，但获得军械，可以增加士气，缩短进军时间，论史者应注意及之。

另一处遗漏，是以换书与换马故事（《随笔》第3页）。今考证写成小文，刊于杂著中，请读者注意。

《堪隐斋随笔》的体裁内容，分为谈书、说梦、札记等类，说梦是说过去，札记是述写作。现在这本《堪隐斋杂著》体例内容，仍沿前轨，首为“说梦”，古人说人生如梦，为欢几何，往事如烟，旧踪难寻，朱熹劝学诗云：“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数十年来，凡学习、研究之过程，均入此类。次为杂论，有关太平天国史事记录。次为杂考，有关于《水浒传》者，有关于明英宗者，以及其他考订文字。末为随笔杂记，大致乃兴趣所至，无关宏旨，盖不贤识小谓乎。多年来东涂西抹，不断写作，立场观点，见于自传，经常自警切忌浮夸，不作哗众之辞，不作违心之论。常以为历史就是历史，既不容易粉饰，也不容易删改，古人对于史书，有指为伪书者，有指为秽书者，所谓伪与秽，其事实如何，亦须研究而后知，我们不是古人，不能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然而时间空间，虽然古今不同，但人性应不致有大差异，对于知人论世，我们谨慎一点就是了。聊抒鄙见，以质高明，是为序。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日菟公书于堪隐斋

目 录

序言 (1)

堪隐说梦 (1)

回忆《逸经》与《逸文》(1)

回忆知堂(13)

记大高殿和御史衙门(20)

题戊戌变法时蜀学堂通知旧柬(28)

释“大挑”(33)

我的状元师傅骆成驥(36)

自传(39)

学史漫谈(51)

堪隐史论 (58)

天王性情刚烈 东王直言劝谏(58)

关于太平天国玺的种种(65)

反帝队伍参加太平军(76)

论洪大全、赛尚阿、丁守存(83)

太平招贤馆(99)

南京的老民馆(103)

太平天国的牌坊及碑文(106)

目 录

清廷对曾国藩既倚重又抑制 (112)

曾军入金陵 (118)

江南洪清两军之消长 (121)

清太两军战后之江南 (125)

曾国藩繁荣江南之措施 (127)

秦淮新柳 (129)

堪隐杂考 (131)

梁山泊的水与施耐庵 (131)

宋时之忠义军与《水浒传》 (139)

《水浒传》人物考 (146)

宋朝的外交和外交家 (154)

罗贯中事迹杂谈 (159)

朝天女户与殉葬 (164)

论明英宗

——一个经历曲折的皇帝 (175)

《虞初续新志》校后记 (195)

堪隐随笔 (201)

论上官婉儿 (201)

朝臣待漏五更寒 (205)

说杨门男将 (208)

目 录

- 顺治呼崇祯为大哥 (224)
从曹家的事情谈清朝掌故
——读《红楼梦》随记 (229)
乾隆阅看《红楼梦》 (252)
记和孝公主 (255)
谈天香楼及允禧书画 (259)
和坤府前身的推测 (264)
慈禧晚年爱哭 (268)
雷以诚重赴鹿鸣宴诗 (273)
郎中庆宽讹诈光绪 (276)
皇帝也有穷亲戚 (279)
妇人七出与再嫁 (283)
皇帝治妒 (288)
换马故事 (291)
闲话苏州 (293)
旧京琐谈 (300)
琉璃厂今昔 (300)
话说大栅栏 (302)
前门为什么繁华 (303)
谈帅府胡同 (305)
王府井谈往 (307)

回忆《逸经》与《逸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正如古人说的“人心之同，如其面焉”，但总起来看，不过两个阶段：一是向前看，展望未来，这是青年人、中年人的追求；一是回头看，怀念过去，这是七八十岁老年人的心态。宋人文莹《湘山野录》引孙冕的诗曰：“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这是说七十岁被强迫退休，不要失望悲观，找一个幽雅的地方去安度晚年，这是豁达开明的想法。老人面对现实，花花世界，风光场合，已无力参加，正与鬼为邻，一步一步走向阴山。据封建迷信时代所绘的阴阳界、指路碑，再进一步，便是另一世界，登上望乡台，俯视家园，无限悲哀，到孟婆庄喝一碗迷魂汤，则又进入朦胧洪荒境域，前事尽忘，一无所知矣。

现在的老人非常幸福，吃着皇粮，悠闲自在，自己也知道保健娱乐；虽然开心，究竟不免暮年寂寞，于是总是回味过去，只有过去，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平生经历，虽然有许多艰难困苦，但都已经熬过来，虽然遭遇浩劫，却依然健在，回顾过去，深感自慰。

我现在已是耄耋之年，生平师友很多，过去很想写一个新儒林外史，考虑之后，未敢动笔，问题是关于写法上的事，如正襟危坐，谈经论道，则诸人已有传记，不必重述；如从侧面描写，写得活泼一点，又恐怕疏忽大意，写走了笔，触犯忌讳，致干未便，说不定还会惹出麻烦，还是谨慎从事为是。现在我要写的，是我过去的伙伴简又文。

简又文，广东新会人，字驭繁，号大华烈士，美国留学。三十年代初期，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是近代研究太平天国史最有成就者，著有《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各三厚册，由美国哈佛燕京社、亚洲协会，及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赞助和私人捐款，于1962年在香港出版，为近代史研究中的大著作。

1931年我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研究太平天国史，有时写些小文在报刊上发表。《北平晨报》副刊辟一专栏约我写稿，专栏曰“洪杨卮谈”，专谈太平天国史事，至1932年夏，约写了一百多篇，引起文坛注意，北京图书馆编的《国学论文索引》把它收入第五编内。就在这时，简又文在燕大正从宗教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国与耶稣教的关系，写文章陆续在《京报》和《语丝》上发表，他写的《太平天国文学之鳞爪》、《太平天国福字碑记》，都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就在此时，胡适之先生介绍我和他见面。胡先生说，你们都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应该互相补益。又说简在海淀燕京大学（即今北大），只有班车，交通不便，进城后暂住东单新开路，让我前去找他。经通信约定，我们在他的住所见面。原来他是从外国人记录方面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主要是外国传教士所作的日记、汇报等，颇有些珍贵史料，因为太平天国把外国人称为洋兄弟，对于太平区域出入，比较宽大，所以外国人对于太平天国内部情况的记录比较早，比较多，他搜集了许多原书和图片。我是根据官方奏报、谕旨及私人日记、信函、

逃难记等，又得到北大教授、故宫文献馆馆长沈兼士的许可，到故宫查找清军机处的档案和清军获太平军的文件等。总起来说，他偏于洋文方面，我偏于中文方面。我们晤谈数次，彼此觉得对方所知所藏，都是自己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颇有相见恨晚之慨。简又文指出，我们虽然常写文章，研究“太平”，总是为人作嫁，范围狭小，许多不便，不如办个杂志，公开搜求太平史料，我们亦可自由发挥，问我意下如何。我漫应之曰，这当然好。后来他又几次提到我们自己办杂志的事，我仍漫应之。我始终认为这是空谈幻想，是高兴时“过屠门而大嚼”的妄念。因为办杂志，需要资金、地址、组织作家队伍，人力物力，都是实际问题，岂穷秀才们所能办。说了以后，我并没有往心里去。后来简又文也不通信，也未进城，这个人消失了。我以为他离开燕大到别的学校去了。

大概过了两年多，他忽然来找我。这次他不住在东单，住在北京饭店，显然阔起来了。我问他这几年不见面，到哪儿去了。他说，他本在燕京大学教书好好的，经人介绍，冯玉祥聘他去。其时冯玉祥自称基督将军，知简是牧师，请他到西北军中去传道。给他的名义，是西北军政治部主任。现在他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家住在上海，有事到南京去开会。后来据他说，冯玉祥的军规很严，禁止抽烟，不许留发，生活非常艰苦，他受不了，因此辞去军职。时孙科任立法院长，因广东同乡的关系，他做了立法委员。这次见面，他又提到办刊物的事，似乎有点具体，希望和我合作，实现我们的意愿。但是我的看法，依然未变，认为办杂志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1934年冬天，简又文从上海来信，称创办杂志的事已筹备就绪，希望我赶紧去上海商量杂志内容及开张等事宜，并说由他任杂志社社长，我任主编，恳切希望合作。并嘱在北京接洽名家，组织作者队伍，反复重申这是我们实现夙愿的机会。又说正

在为我物色住房云云。我接信后，一方面高兴：这确实是我们过去所希冀的，不意空谈竟成事实。但同时又使我大大为难，因为我自1931年起，即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至此已三四年，对于学校课程，基本顺利，对于学术界，亦逐渐熟悉，在北京已安居乐业，现在忽然要离职去沪，另起炉灶，困难太多太大，南方生活环境，是否适应，亦颇顾虑。思考再三，为了学术上的追求，对朋友言而有信，读书人讲究重然诺，于是毅然离京赴沪。老实说这是年轻人不怕牺牲的勇气，就我个人说，是改变生活的一件大事。

到了上海，简又文表示欢迎欣慰。我住在金神甫路租的小屋，雇一娘姨烧饭。后来迁至拉都路。简又文住在大西路，是当时的高级住宅区。我们详细研究了杂志的目的、性质、名称、内容等，决定杂志的宗旨、作风，是求实，重人重文；内容注重文史。我们认为文，不仅是文学而是文化，范围广阔，包括典籍、学术、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史则包括考古、逸闻、野乘、掌故、历史考证、幽默故事等，总的宗旨，在高尚雅洁而趣味浓厚，文字深入浅出，务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不尚清谈，不发空论。杂志定名为《逸经》，取《辞海》说：“汉时，经书之出自屋壁，未置博士肄习者，称逸经。”定为文史半月刊，经过与各方联系征稿，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五日出创刊特大号，定价一角，销行国内外，约两万余份，美国国会图书馆长期订购。计算起来，不为牟利，也不亏本。

我们邀约的作者，在当时多属第一流，北京的有周作人、俞平伯、老舍、谢刚主、瞿兑之、谭其骧、王重民、徐凌霄、徐一士等，南方有柳亚子、林语堂、郁达夫、胡怀琛、冯自由、刘成禺、温源宁、许钦文、赵景深、陈子展、谢冰莹等。《逸经》的内容，主要是搜集太平天国史料，这是简又文和我办杂志的共同目的，确实也征求到了许多极珍贵的文献，如王重民在英法所影

印抄录的《太平天日》、《资政新编》、《钦定军次实录》，都是国内未发现的太平天国本身典籍。李鄂楼所藏的忠王李秀成墨迹，江西胡友棠收藏的《干王洪仁玕亲笔供词》、《幼天王、愍王、昭王的原供》及萧一山的《李秀成致赖文光谆谕并跋》、张峻松《石达开黔西遗诗之发现》，均系原始资料，为向来所未见者。

我和简又文曾到嘉兴去查看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驻守嘉兴时的王府，即清朝的知府衙门。我们拓回了荣王廖发受守嘉兴的炮台碑，共两件（我拓的一份，裱成立幅。后因开近代文物展览，将此二轴碑片捐献给革命博物馆，给我了四十元保管费）。后来简又文写成《浙江文献展览馆的嘉兴文献》，刊于《逸经》。以上这些，可说是《逸经》的特色。

其次便是关于人物传记和随笔，有燕大赵紫宸写的《当代教育家吴雷川先生》，有北大英文系主任，后任立法委员温源宁撰写、由倪受民译的《胡适之传》、《周作人传》、《徐志摩传》，二爻译的《林语堂自传》等。有徐一士写的《荣禄与袁世凯》，王芸生（署名草人）写的《袁世凯与甲午之役》。徐一士还写有《谈段祺瑞》、《谈徐树铮》、《谈散原老人》。徐彬彬写的《凌霄汉阁笔记》、《谈谈状元》，谭其骧写的《从董鄂妃谈到张宸》。值得注意的，有冯玉祥写的《近代第一廉吏王铁珊先生》及署名壁树（喻大树将军之意）的《国民军首都革命纪实》，这是冯氏生平最重要的事件，故他不愿署真名。还有瞿兑之的《读史零拾》。以上这些传记性的文章，都是有内容有价值的著作。

《逸经》有两篇长稿，一是老国民党冯自由写的《革命逸史》，一是老作家刘禹写的《洪宪纪事诗本事注》，深受读者欢迎，后来都印成专集。

关于散文、杂记的文章，真是名作如林，有周作人的《日本杂事诗》，俞平伯的《癸西南归日记》，《丙子新正二律诗》，林语堂的《与又文先生论逸经》，《中国人与英国人》，郁达夫的《饮

食男女在福州》，老舍的《像片》，许钦文的《淫妻》，《咫尺天涯》，冯沅君的《裹足》，谢冰莹的《夜间行军》、《世界变了》等等。

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鲁迅先生病逝，《逸经》同人送去挽联，另有许钦文写的《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姚萃农的《痛悼鲁迅先生》、杨霁云的《琐记鲁迅》等。其他还有些零星记录，纪念此一代大师。

关于简又文，在旧社会的习惯，与学术界朋友接触，只谈学问，不及其私，这是礼貌问题。及至我和简又文共编《逸经》，朝夕相对，对于他才有一些认识。他的住宅名为斑园，我问他有何取义，他说，他的名字中有一文字，他的夫人名玉仙，所以用“斑”字名园，表示共同生活。我问他称大华烈士之意——自来壮烈牺牲者，誉为烈士，岂有生人而自称烈士者。他说曹操的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可见生人亦可称烈士。至于大华烈士，系俄语同志之义。我认为他是一位潜心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学者，著作等身，成绩辉煌；他不是政客，但在政界文坛，非常活跃，与立法院长孙科、军委会冯玉祥的关系很深；他不是资本家，但是南洋烟草公司有同族本家，所以以他的这些条件和背景，办个杂志是很容易的。

我在上海住了一年多，一切都比较顺利，惟对于环境气候、生活习惯，总觉得不太适应，总是恋恋于根据地北京，至1936年底，编辑《逸经》二十一期后，我即辞去《逸经》主编职务，由陆丹林接替，我仍不断给《逸经》写稿。其时老友萧一山接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长，要增聘四位教授，这四位教授是范文澜、杨宗瀚（伯屏），还有一位姓余的和我，因此我便离开上海到了开封汴梁城。

在上海也有一些生活方面的琐事，值得回忆。我住在拉都路，门口便是22路公共汽车，直达徐家汇天主堂，经朋友设法，

得到马相伯老人的同意，我可以到藏书楼去看书，去了多次，所见全是宋元善本，曾写下读书记笔录一小册，后来屡次播迁，此册遗失，真可惜也。

上海城隍庙的小笼汤包，称为美食，物美价廉，我常去小饮。其特色旧货摊的货物，非常丰富，我常去游览，曾购得古钱币及石砚古玩等，无事在曲栏展望，增人雅兴。

有一次斑园的座上客和我，要求简又文请吃龙虎斗，据说这是广东名菜，大补。简又文有点为难，因为龙虎斗所用的猫与蛇，并不是普通品种，价值比较贵，结果简又文还是命他的厨师作了一盆龙虎斗，但是很遗憾，我们看着都不敢吃，觉得很惭愧，深感不安。简又文无奈，只好奋勇大吃特吃，满头大汗。简又文很有修养，没说一句后悔、抱怨的话。

北京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被北平市长袁良驱逐出境，到了上海，在恩派亚剧场演出，更红极一时。我每天从那里经过，曾去看她演的《马寡妇开店》、《珍珠衫》等，都是她的拿手好戏，见国民党大员孔祥熙及其友人戴着大墨镜坐在包厢里。当时的上海，实南京的别室，简又文、冯自由均居沪，只开会时才去南京。

一年之后，芦沟桥事变起，抗战军兴，《逸经》出至三十五期，简又文移居香港九龙，与林语堂办的《宇宙风》合并，取名《大风》，在香港出版。我在北平曾接到《大风》第一期，以后即无消息矣。

由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转眼之间，四十年过去了，有人给我一份材料，是台湾刊物《传记文学》，上面有简又文的文章，还提到《逸经》和我，没提到萧一山。时萧正任台湾博物馆馆长。文化革命期间，文物局长王冶秋找我，说有人介绍简又文收藏的太平天国文献文物及名人字画，想出售于国内，索价五十万元，问我如何。我说简又文想把他的收藏送还国内，这是爱国思想的表现，应该接收。后来未见到王冶秋，此事便作罢论。再后

听文化界人士称，简又文这批文物，已售与美国某大学博物馆，闻之不胜惘然。大约在1980年以后不久，我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荣孟源闲谈，荣说简又文想回大陆工作，所索报酬，当局未允，以致搁置，我和荣深为慨叹，认为学人回归，乃大好事，何必斤斤计较，非按常规不可。又不久闻简又文在九龙逝世。《逸经》的故事至此全部结束。

回头来再说《逸文》，1945年春夏之交，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前夕，国人欢欣鼓舞，重睹升平，不禁想起杜工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激动心情，古今相同。当时学术界的人士，文坛上的朋友，久屈思伸，静极思动，大家共同的想法，就是办一刊物，舒展情怀。群策群力，众警易举，推我主持编务，命名《逸文》，盖欲继《逸经》之后。相距十年，就我个人来说，亦一里程碑，不可不记也。

《逸文》系文史月刊，作者大半系过去《逸经》旧人。有周作人、徐凌霄、徐一士、傅芸子、傅惜华、谢刚主、崇焕卿、刘厚滋等，内容翔实，不逊《逸经》。第一期创刊号的文章，有知堂的《关于送灶》，文章颇长，内容精审，引证古今民间传说，在知堂的文章中，尚属少见。署“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八日”，盖筹办时所约稿。徐凌霄的《谈于晦若与宪政》，于晦若即于式枚，此文评述清末政局中人事关系的遗闻。傅芸子的《东瀛鉴古录》，傅惜华的《西调与小曲》，刘厚滋的《秦代刻石风尚来源之推测》。厚滋系《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嫡孙，继承家学，专究考古，享名于时。崇焕卿写有《清代八大家王府沿革琐记》。崇氏满族，汉名刘振卿，熟悉清宫掌故，《大公报》辟专栏刊其长稿，约稿时欲为我写慈禧秘史，此题足称专著，因世人所不详又难于考证也。我写的《洪杨遗事》，仍系平日论史笔录。一庵的

《读论语忆姚颖》，则是一篇极有意致的文字。姚颖系三十年代后期著名女作家，作品《京话》风靡一时，读者多不知其究竟，我特请一庵根据文坛往事加以评述。一庵文云：“民国二十一年林语堂创办《论语》于上海，提倡幽默文学，一举成名，由此幽默大师的徽号，传遍中外。按林氏重在技艺，四五年间，造就不少知名当世之人物，女作家姚颖，便是其中的一位。凡读过她描写南京新官场现形记——《京话》的，一定感到她是个风流不羁、滑稽突梯的人，不然，她怎能写出尖酸刻毒、嬉笑怒骂的文章来。诚然，当时颇有一部分官僚政客，甚至于政府当局，被她笔下捉弄，调侃得哭笑不得，难怪乎《京话》刊布，竟万人争诵。待《论语》二周年纪念，将其芳影刊出，附有娟秀签名照片，玉立亭亭，颇觉幽娴文雅，爱好其文笔，睹此殊可一饱眼福也。按女士系江苏奔牛人，毕业于中央大学后，与南京市政府秘书长兼社会局长王漱芳结婚。其所作《京话》取材，大都由于婚后交际所得随感之反映，取材自属便利也。闻友人言，林氏办《论语》以来，写各地通讯文章，运笔犀利、刻画入微，而讽刺酸刻者，除姚颖外，无与伦比，是故林语堂叹为惟一的杰出人才。”一庵的这篇文章，对姚颖有恭维也有微词。

当时上海画家汪子美，画一漫画《新八仙过海图》，画中人物是：蓝采和——俞平伯，张果老——周作人，李铁拐——舒舍予，韩湘子——郁达夫，汉钟离——丰子恺，曹国舅——大华烈士，何仙姑——姚颖，吕洞宾——林语堂。这幅画简又文以二十元购得，刊于《逸经》，我写《新旧八仙考》附之。文中写道：“林语堂氏提倡幽默，创办《论语》，世人以在《论语》上经常发表文字之台柱人物拟为八仙，林氏亦承认不讳。如林办《宇宙风》第一期，林跋姚颖文云：‘本日发稿，如群仙齐集将渡海，独何仙姑未到，不禁怅然。适邮至，稿翩然至。’语堂重视姚文，文未到时，盼望极殷；文到后欣喜之至，情态如见。”按姚颖事知者不多，一庵详述之，足存文坛轶闻，其